

危机中的‘思’革——知识分子与五四

赵睿¹,董良永²

(1. 华东师范大学 社科部,上海 200062; 2. 永川景圣中学,重庆 402180)

摘要 五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发展。在此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反思”为主线,描述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进行反思的特点,以及知识分子反思五四及反思五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关键词 反思 知识分子 五四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8)01-0054-04

“反思”一词,是近代西方哲学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十七八世纪的西方,这个概念指有较高价值的内省活动,即“心灵内部的活动的知觉”。如今,通常把反思视为对自己的思想、心理感受等的活动,指一个人对所做事情、所持观念等的一种重新思考、评价和认识。就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两个字,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不会被跳过、也让人最为困惑的字眼,因为“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成为“反思”不可缺少的主语,因而知识分子反思不仅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现象,也成为后面知识分子进行再反思的对象和客体,遂知识分子反思和反思知识分子成为一对共生的话题。

一、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思

如果假定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人格化代表,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的话,那么应该说,晚清文化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总的来说,晚清文化是中国挣扎着走出中世纪所呈现出的社会变迁的重要一面,表面上看,它是有与无、中与西、新与旧的冲突和交融,深层次则是民族生存方式和群体观念的巨大变革。

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他们在近代文化的传播与变迁过程中,无疑担当着二重角色,即“知识分子自身从传统型的转变角色和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角色”^[1]。的确,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的不是知识的不断扩大与更新,不是文化的创造和积累,而是维护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帝国统治。因此,他们在近代社会的变轨中还需要经历自身的

蜕变和适应。另一方面,传统走向现代的这一过程是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近代性转变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成长有赖于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思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这一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冲撞激烈,出现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传统主义等多种、多重思想相交融。复杂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以及文化反思的差异。身份变化是知识分子走出传统的根本性动因。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士人的不同,在于他们逐步与政权相分离,不再以入仕作为知识分子唯一的价值体现。新式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成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进入新式行业,成为医生、教师等专门性人才。如陈平原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一书中讲到近代报刊业的出现,作家开始领取稿酬,而且很多作家已经开始倚靠稿酬生活,以及读者成分的改变等等,这些状况,都是导致文学格局、文学形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通过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逐步改变了社会的心理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固然,身份变迁和文化反思不一定呈完整的正相关性,但是通过其文化反思的路径分析,则能品析出知识分子的这场反思革命背后知识分子群体的某种特征。

首先,从反思的内在力看,内忧外患则是近代知识分子思考的出发点。应该看到,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开始难掩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下坡趋势。外患更加剧了这种状况,使其面临崩溃的

境地。尽管入侵者——西方,从中国的评判角度看,一方面,他们是和我们隔绝的蛮夷,另一方面,他们的入侵行为在道德上为国民所垢耻。然而,无论我们有什么千万种拒绝的理由,都不得不让知识分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对于西方文明,知识分子首先反思的是“技”不如人,洋务运动基本以“中体西用”为主旨,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然而西方器物的引进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危机,尤其是甲午海战的失利,促使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反思。国民开始意识到传统观念形态的不足,知识分子也开始反思,从而有了对传统文化观念体系的抨击和批判。晚清的知识分子主要围绕着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然而,政治制度的变革终于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但是,新的北洋政府并没有把中国引向独立和发展,一场重新思考传统社会以及国民性的大思潮一触即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知识分子近半个世纪反思的最集中的体现。总而言之,近代社会深刻的社会转型,使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们投身于现实变革的理论和实践之中。

其次,从反思的内容看,知识分子一直徘徊在如何对待传统和对待西方文化的认识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磨难,作为被侵略和欺凌的一方,自然会以一种这样的逻辑来展开思维:因为落后所以挨打,而侵略者之所以强大和发达,不是简单因为其武器先进,因为技术的发达只是其社会发达的一种外在表现,其强大的真正原因在于其政治和经济。正是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才造就了强势的西方社会。自然,我们在对传统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时,便会以西方观念形态作为参照系统,简单地对传统文化予以抛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世纪国家来说,社会的变革往往呈现越来越激进的态势。但是,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是缺乏系统性的,而且社会的剧烈变化也容不得知识分子去对西方社会做细致的考察,加上对帝国主义入侵的仇视和戒备,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正确估价。当准西方制度移植到中国社会中遭遇问题和困境时,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别以及文明何以可能的问题。所以,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包括孙中山等都是“以反传统始,而以复归于传统终”。孙中山晚年极其强调“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2]。这种文化回归现象,反映出转型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即

文化自卑感和自豪感同在。

第三,从反思的结果看,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由于“语言”相比于“思想”的贫乏,我们往往用某某“主义”来表示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应该承认知识分子的分化是反思传统和展望未来所导致分歧的必然结果,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在思想激荡的作用下,才使思想界在20世纪初,这样一个中国转型时期,出现了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涌现出北大等以兼容并包为主旨的一批优秀的高等学府,诞生了“文学研究会”、“太阳社”、“左翼联盟”等进步社会团体,创设了《新青年》、《努力周报》、《新月》等针贬时弊的近百种刊物,引起了“主义与问题”、“整理国故”等众多知识分子参与的争论,他们对社会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也反映了他们对传统思想和社会资源如何扬弃态度的差异,更反映了对未来社会发展路向的不同思考和实践。这种分化,不可避免地造成文人集团的形成,从文人社团和同人刊物中,以及他们的种种文化论争中,往往可以看出文人们这些弱点,它在一定意义上消磨了知识分子的锐意和智慧。在国难时期,知识分子还能团结一致共抵外侮,文人集团的差异和分歧还不显现;但是,在对于国内发展的道路选择上,文人团体的政治倾向则显得比较明显。分化和分歧本身无可厚非,只是他们的选择从后来新政权的角度看,则被区分为进步和倒退,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如此一来,知识分子分化势力的消长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前途,另一方面也注定了不同集团下知识分子命运的不同。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既有深刻与深远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弱点。这些正面的、负面的因素,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二、反思五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反思传统社会的必然结果,它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而掀起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西方各种“思潮”、“主义”在这一时期大量涌进,迫使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中西文化交汇中,重新组合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的以“全盘西化”为主体形成“西式”文化心态;有的以“东方精神文明”为主体形成传统文化心态;有的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形成“中西合璧”型文化心理结构。总体说来,如何重建中国文化是五四

知识分子迫切而实际的中心课题。“五四知识分子认为 如果要重建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精华是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赛先生’与‘德先生’。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要重建中国文化,不但要热烈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且需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因此五四对重建中国文化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就是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思想。”^[4]应该说,重建中国文化的第三个重心则是对国民的反思。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开始对国民性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意义作彻底的反省和探讨。五四的人本主义含有批判精神,提出“要重新发现人”,对现存的和既有的人的观念,人的价值和目的、人的行为和制度,作一番彻底的检讨与反省。他们开始追问: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培养哪种人格,建造哪种社会才能发扬所谓的“理想的人性”,体现现代人的意义。为此,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于是五四,这个由知识分子创造的“时代”,不断为当时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知识分子所称道和反思。当然,促使当时知识分子反思的背景主要是他们逐渐观察到五四实践的有限性,以及不少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自觉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始以冷静、务实的精神,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如,著名作家老舍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老张的哲学》,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校是新的,但是从人到教学内容都是旧的。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反映了五四带来了反封建的进步性,但另一方面,当初被五四文化新军猛烈扫荡过的孔教,早已形成了一种很深的文化积淀,它潜藏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人物心灵深处,影响着他们,制约着他们。可见,五四提出的反封建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它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另一方面的反思,是来自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反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将五四运动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他们把五四视为过时的旧时代,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作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五四运动脱离群众的局限性,也指出了五四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不能带领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繁荣。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们启蒙民众背后所承启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精英主义的世界观,其历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过:“五四运动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4]这个运动,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

到工农群众中去。应该和广大民众紧密结合,转变立场,才能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尽管在反思中出现很多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客观,乃至贬低五四知识分子的言语。总的来看,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的评价还是深刻的,为知识分子深入民众,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五四,随着历史的推移,它终于为后人的进一步反思提供了时间跨度,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客观地审视这段知识分子的“事业”。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它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考量,可以说五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为知识分子投身社会运动立了表范,它为同人刊物的办刊风格奠定了基础,它为文人团体的主张提供了参照等,甚至 20 世纪前页的整个文人行为方式、思想状况和文化环境都无不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它的一些传统至今都深深的积淀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不过,毕竟五四不是一个神话,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反思还是颇能发人深省。

首先,功利主义的泛滥给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一条能让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所以他们饥渴的学习西方,把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文化传到中国,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制度,从进化论到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中国成为西方思潮涌集,思潮切换最为频繁的国度。西方的种种主义都成为救国的良方而被广泛宣传 and 试用,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社会思潮之频繁让人叹为观止。这种走马灯式的为中国社会寻找药方,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价值选择取向,缺乏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这种缺乏理性的价值选择,便滋长了功利主义的产生。所以近代知识分子不乏新思潮、新变革及领导新思潮、新变革的领军人物,然而真正常青的并不多。王晓明曾指出:“《新青年》个性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5]。问题在于这种功利主义思想的存在对中国文化环境的巨大改变。一方面,功利主义背后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和国情,缺少具体考察和认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对西方思想缺乏如何拿来主义和进行中国化的思考和分析,这种倾向势必产生一种浮躁的、武断的、非理性的文化环境。

其次,知识分子的分化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派系之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社团的形成对知识分子本身,以及文学史的建构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们或“团结在一个文学主张下面”或“为自己的文学主张斗争,用自己的文学主张号召读者。”或在创作中表现出“对人生对艺术的模糊的共鸣,共同的兴趣或共同的态度。”^[6]但是,文学社团的诞生也

不可避免的产生宗派主义。郭沫若曾说过：“一种团体无论是怎么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7]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就曾指出，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1946年5月4日，《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①。社评的主旨，是谈五四对过去30年的文艺产生的影响，“从而探索中国文学今后应走的途径”。它例举五四的功绩，但是也着重批评五四时期的“幼稚病”，一是对于“本土传统”，对于“过往一切”的“弃如糟粕”，另外一个则是文坛缺乏民主的风气。的确，左联成立以后，宗派主义的余度依然不绝。1932年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战，则充分表现了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而1934年，又爆发了被鲁迅称为“妇姑勃谿，叔嫂斗法”式的两个口号之争。1949年后的历次文艺论战，宗派主义的影子都无处不在。到“文革”则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文坛的宗派主义的思想源头则是把文艺当作政治，其迅速发展，屡改不止的原因则是文学团体政党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看到，在“文学界做生涯”，宗派和“势力”很重要，但更应该看到这种宗派背后对文学界，乃至知识分子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三，知识分子政治化制约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发展。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变革之中，最为直接的就是投身政治活动之中。虽然在1919年前，当时的思想界还有视政治为“万恶之源”，纷纷以不谈政治为清高^[8]。胡适也要求《新青年》同人们“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9]，但是五四以后，社会风气都陡变，谈论政治的风气越来越浓。此时杂志和报纸副刊的媒介作用更为凸显，“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反而不能安于社会边缘，像早期‘游戏文章’的作者们一样，一方面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作时政风尚的批评，一方面也借游戏和幻想的文体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的缔造。”^[10]总之，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高涨，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主义极为关注，所以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当时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样式有3种，一种是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一种是继续以知识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社会，与政治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大众传媒工具批评时政；另一种则是联合组党^[11]。可以看出，无论是好人政府，还是国民参政，在当时军阀政治暗无天日的统治

下，知识分子尽管尽量想保持自己独立的理性声音，但是终难做到。他们往往不得和政治势力相联系，试图通过政治的方式改变社会和国民性，结果便是知识分子自身独立性在政治的权力斗争中逐渐消磨和丧失，其文化创造和传播功能逐渐减弱。

纵观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五四以来的进步的新文学开创者们差不多都在反思历史、批评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又进行着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一代一代地传延着，不仅推动着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建设，而且也为他们制造的文化成果增添了活力和激情^[12]。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的是“同构”的，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从近代走来的知识分子他的所思，它的“遗产”直接影响了后来者。作为主导和经历五四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停止思考，在反思中，他们继续前进，在反思中，他们对自身和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进一步的思考。知识分子的这种积极的反思态度，对学术界和整个中国的文化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王继平.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5.
- [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485.
- [3] 张灏.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30-231.
-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0.
- [5]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J].上海文学，1993（4）：68.
- [6] 胡风.文学修业底一个基本形态[M]//胡风.胡风评论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69-370.
- [7] 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49.
- [8] 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5-197.
- [9] 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00.
- [10]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M]//李欧梵.李欧梵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54.
- [11] 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39-40.
- [12] 谢昭新.理念、创作与批评：20世纪实际中国文学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204.

① 这个社评后来成为文艺界纷争的重要事件之一。